

我国体育人类学民族志中主客位关系的表述危机及消解

张越, 林志义, 杨海晨

(福建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17)

摘 要: 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两股社会思潮推动我国体育人类学民族志研究的发生与发展, 以“研究者自我主体意识保留空间大小”划分出“科学民族志、解释人类学、实验民族志”3种民族志表述类型, 并辅以具体的体育人类学案例批判, 说明研究者在不同阶段可能存有的身份困境。研究认为在既往人类中心主义取向的民族志人文研究中, 主体与客体始终需要相互对立的前提。后现代体育民族志的反身性镜像思维无疑加剧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二元割裂, 遂提出后人文主义视域下的衍射分析与研究组合, 或能以物质性力量与去人类中心主义思维, 一定程度消解研究者对于民族志过程的影响。

关 键 词: 体育人类学; 民族志; 主客位关系; 主体间性; 后人文主义; 新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25)03-0049-07

The representation crisis and resolution of subject-object relationship in the ethnography of sports anthropology in China

ZHANG Yue, LIN Zhiyi, YANG Haichen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Scienc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17, China)

Abstract: The two social trends of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hav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ethnographic research in the sports anthropology in China, and that divides ethnography into three types such as scientific ethnography,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and experimental ethnography based on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researcher allows space for self-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along with this distinction is illustrated with specific examples from the anthropology of sport to critically examine the identity dilemmas researchers may face at different stages of their work. It is argued that traditional anthropocentric ethnographic research relies on a mutually antagonis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The reflexive and self-aware approach in postmodern sports ethnography intensifies this dichotomy. In contrast, it has been proposed that a post-humanism perspective of diffractive analysis and research assemblage, which may be able to somewhat dissolve the researcher's influence on the ethnographic process with the power of materiality and anthropocentric thinking.

Keywords: sports anthropology; ethnography; subject-object relationship; intersubjectivity; post-humanism; new-materialism

体育民族志将人类身体活动及其相关文化作为研究对象或目标, 旨在以研究者自身在相关区域体育生活中的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真实准确反映现实世界。但同时作为一种文本书写方式, 体育民族志研究者的社会背景、个人禀赋、学术偏好等也直接或间接影响民族志作品的表述形式、叙事风格以及理论深度。所

以说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民族志取决于研究者本身的角色定位^[1]。

我国体育人类学研究在调查与写作范式的更迭中有着对主客位问题的不同考量。研究者在多重话语交叠的时代语境与文化迷雾中究竟处于体育民族志的何种位置? 体育人类学研究者的角色变化对其民族志写

收稿日期: 2024-10-3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3BTY079)。

作者简介: 张越(1998-), 女,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体育人类学理论与实践。E-mail: yuey_zhang@outlook.com 通信作者: 杨海晨

作方式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若既有范式仍存有不逮之处,未来体育人类学民族志研究又能去往何方?

围绕这些问题,研究将以“研究者自我主体意识的保留空间大小”^[2]为线索,并参考人类学民族志的表述范式,大致划分出体育人类学民族志表述范式的3种类型:科学民族志、解释人类学、实验民族志。同时辅以体育人类学的具体案例批判说明研究者在不同表述范式中的身份困境,并对体育民族志研究中主客位关系的未来可能进行学理性阐释。需要说明的是,递进式论述仅是出于方便阅读的需要,并不排斥范式间在时空甚至观念上有重叠的可能。

1 体育人类学研究者“自我他性”的逐步自觉

1.1 科学民族志:体育科学假设验证的客观指向

科学民族志强调研究对象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研究者需要像科学家带着理论假设进入实验室一样,准备好问题与理论去选择特定的社区进行至少一年的现场调查并使用当地语言优先从本土观点参与体验^[3],以便使得自身认识符合“异文化”的客观情况与内在规律^[4]。有鉴于体育运动的身体活动特点,胡小明^[5]提出体育人类学应该是联通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的桥梁,需要关注体育运动因素对于人类体质结构发生的影响。胡式范式的科学实证倾向主要体现在经验与假设、材料与材料之间的相互验证关系之上。例如,在纳西族的“东巴跳”对东巴文字的形成关系研究中,研究者率先提出“身体运动对东巴文字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显示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具有旺盛的生命力”^[6]这一假设,而后通过一系列的身体测量、动作分析验证假设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最为理想的科学民族志需要一套类似于胡氏范式的标准化实证程序,在其间研究者保持价值中立并尽可能避免与被研究者产生情感上的交互或任何可能混淆研究结果的联系。表现为只有通过实证的方法掌握绝对知识生产权,研究者才不会被可能的价值判断所左右。但从我国体育人类学实际的田野浸入程度看,可能是由于后勤保障无法满足的原因,或许是受专题式田野调查的学术导向影响,大多数研究者短期、多次、间断的田野调查无法满足材料间相互佐证的需要,只能在科学民族志文化整体论与结构功能论的认识论基础上“记录体育活动过程、收集一手材料以及从功能主义角度进行解释”^[7]。为体现客观、公正以及全面的科学研究要求,“研究者本人”一般不被鼓励或允许在该类民族志书写中出现,例如,万义等^[8]的“湘西德夯的田野调查报告”就着重以条框式表述极力规避研究者个人风格对湘西苗族鼓舞整体图景的影响。

有时研究者还需要通过各种叙述技巧努力制造出“离场”效果。反观周传志^[9]在台湾省所做的“宋江阵”社会人类学研究虽以夹注的形式透露田野现场,但也仅是为了让读者体会到研究者“到这里”的现场感,某种程度上亦是提升民族志真实性与权威性的一种潜在手段。

分析我国体育人类学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会发现很大程度上是沿袭了马氏功能主义学派所追求的“客观科学”导向,也受到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影响。科学民族志始终存有研究者对他者文化素材的“筛选”与“加工”^[10]。

1.2 解释人类学:体育文化事实阐释的反思倾向

解释人类学民族志在承续科学民族志有关“客观性”追求的同时又希望摆脱“科学性”的束缚,转而开始注重对文化事实意义的探求。格尔茨^[11]的《深层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一般被学界认为是体育人类学研究的起点,其不仅限于观察当地人对斗鸡的精心饲养与训练,也不局限在描写斗鸡比赛的过程与规则,而是致力于通过“文化深描”的方式以“局内人眼光”阐释隐匿于斗鸡游戏中的社会秩序。为实现阐释文化事实意义的目的,研究者必须对研究对象的认知模式进行审察,争取以文化主体而不是研究者本人的概念与语言来描述文化,同时强调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双主体性位置。这种对文化主体的关照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当时的主位与客位之争,认为将文化主体的近经验与研究者的远经验进行“视域融合”能以全新的视角观察与阐释文化^[12]。

受解释人类学的影响,部分中国体育人类学者采用解释范式将文化视作意义系统进行研究,强调民族志写作是一种人为的认识过程与结果。如钟喜婷^[13]在《道德重构:民间体育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动员的地方实践》一书的“方法交代”部分对科学民族志的客观性问题加以反思后认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程度也是极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在这样一种相互关系之中,研究者在阅读文化活动与象征符号的同时也在被所谓的“被研究者”阅读着。钟喜婷在初涉田野之时林村村民并不知晓她来村目的,“他者眼中的她者”常被误以为是出门闲逛的家庭妇女或是男性研究者的助手,在调查屡次陷入僵局后通过积极调换研究策略反而最终以田野中的女性访谈优势收集到更为翔实的田野材料。通过采取辩证式的策略在民族志作者与文化主体之间建立起对话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践行中国情境下“我他互称、我他转化、联他为我”^[14]的关系认知与文化实践。

但是作为表征的语言一旦在民族志研究中被加以重视,一旦与特定的研究目的、社会情势以及各种处于固有脉络中的社会活动相结合,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实际对话也即成为不同语词使用者及其整个社会势力与社会关系的力量对比与权力角逐过程^[15]。于是在解释人类学所倡导的“主体性”世界里,笔者也不禁疑惑:研究者何时是文化持有者?何时又摇身一变成为调查者?如何能够在“角色的我”与“真实的我”之间保持微妙平衡?

1.3 实验民族志:体育身体主观能动的反身取向

格尔茨的弟子克利福特^[16]认为,解释人类学倡导的民族志模式与其批判对象一样无法摆脱研究者的个人主观性且始终面对着客观性的虚假问题。于是主张倡导一种更为多声与众声喧哗型的新民族志,由此学界出现一股对民族志做出新实验的潮流。尽管在实验民族志中研究者的主体性地位依旧存在,但多重主体叙事的功能发挥也即意味着研究者已经由“实在主体”转向“关系主体”^[17]。在拥有类似的自觉意识之后,越来越多的体育学者开始以“反身性”思维探索民族志研究,大胆将自身与被研究者“并置”或是以“自我”作为实验民族志的关注焦点与阐释中心,以便深入了解如何阅读、理解甚至参与“运动的身体”^[18-20]。

同时为避免可能的预设,研究者允许民族志自我通过表演与具身的力量产生新的权力联结形式,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他成为了(他)开始提出问题的规范”^[21]。在后现代体育人类学民族志中,调查的关键且必要手段即是与报道人共同参与体育活动,相较于解释人类学以话语为指导的“移情”策略,研究者与报道人借由身体运动所产生具身“共情”能够有效突破报道人“无可表述或是无法表述”困局,进而更大程度接近“主体呈现的真实”。明确承认研究者的主观性是实验民族志方法反身性的基础,这也就迫使研究者在田野工作展开之前就质疑与审视自身存在对研究过程与结果分析可能产生的影响^[22],而不是在民族志写作即将完成之际用自白式的“忏悔”一笔带过研究者已经造成的影响。研究者在与被研究者共同创造的物理文化背景中所发挥的隐含作用^[23],一定程度上直面“摇摆人”身份的模糊性与折衷感,也为体育民族志在协商研究立场时创造出多重表现“自我”的可能性。

相应的“他性”基于自我的特殊反身性理解也能生成合法性意涵,自我民族志的研究范式即为搭建自我田野观测场域提供可能,但研究者也需要借助他者化过程才能实现自我研究在方法论层面上的可供性^[24]。

“一个专业乒乓球运动员群体的自我民族志”^[25]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后现代民族志的反身性意涵以及

自我民族志的“脆弱、危险与叛逆”^[26]。杨磊等^[25]以“我及我们”专业乒乓球运动员经历为主线,辅以中国社会变迁以及竞技体育体制改革进程,通过若干个还算细致且相对独立而又互相联系的“事件”片段铺陈,呈现出专业运动员带有独特时代烙印与社会文化属性的自我身体图景。无论该文的第一作者在民族志书写中处于对象化的哪一端,“回到事实本身”的现象学逻辑还原线路最终都指向重塑主体之我的能动意义。其民族志的广角镜头^[27]向外是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底蕴,向内却暴露出一个脆弱的自我,遂即通过自我镜像结构反射出国家符号话语背后的象征资本以及个人对于该种话语的反向征用。

似乎我国体育人类学界争论的民族志主客位问题在主体间性的反身性思考中应当已经有了一个妥善的解决。反身性思维于民族志研究中的运用本是为解决科学民族志中“自我不可见”的指责而在后现代转向中做出使“自我可见”的种种努力^[28],但不论是可见与否或是可见后的互为主体,民族志研究中的主体与客体始终需要一个相互对立的前提。那么,在这一前提下主体也必须采用“语言游戏”修辞形式,对表征“屈服”才有可能诉诸于文化。

2 后人文主义重新制定体育民族志的主客位关系

2.1 从“反射”到“衍射”:物质材料干扰研究者连续性思维

巴西人类学家卡斯特罗于2003年在曼彻斯特大学召开的人类学和科学会议中首次提出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学界由此开始将论述重点从对认识论的控诉转移至本体论的进路讨论中,从而尝试为人类学家们反复从镜中端详自己的自恋行为画上句号。认为既往人类学的认识论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人如何“表述”唯一现实世界,而本体论进路重视的则是诸世界的存在^[29]。主体性被重新定义为扩展的自我,其关系能力不再局限于人类物种(人-人主体间性),而是包括各种非拟人化的元素(人-物主体间性)。我们对于世界的感知、我们的意图或是行为也都不再被理解为源于个体间的内心世界感受,而是“我们的每一个陈述都是机械组合的产物,人类表达仅是多样性的集体代理人”^[30]。

以此回顾后现代体育民族志所推崇的反身性策略,发现其恰恰在于用研究者的语言结构塑造并决定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并一开始就假定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存在分离。尽管在体育学的身体转向^[31]背景下,既往研究充分考虑到了研究者的亲身体验,也以此解释了体育调查环境中权力生成与运作^[32],但同时

必须注意到实验民族志中的运动身体如何将社会建构的逻辑彻底践行,仅仅使身体成为话语活动的一环。哈拉唯^[32]认为过分强调符号必然造成对物质世界的忽视,实际上犯了抽象理论高于实际生活的错误。因此她同样以光学现象作为隐喻,提出用“衍射”取代反身性研究^[33],试图摆脱社会科学研究被束缚已久的表征模式。作为光学现象的衍射与反射的实际表现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二者在方法论层面所存有的差异。作为一种意义制造的叙事或是政治技术,衍射能够将我们与研究者之间的图像由对立转换为差异,并在此过程中将研究者的知识生产观念从反映或者镜像现实转变为对现实的嵌入、定位以及关系描述。受玻尔量子力学理论启发,巴拉德以其“能动论”进一步丰富了“衍射”的基础概念,认为制造差异的障碍物或观测装置时刻参与并影响着文化的建构,而语言和意义的构成性作用也需要在物质世界中找寻到某种立足点或与物质世界进行某种互动^[34],这样形成的物质-话语实践才可能打破主客位的对立结构与传统线性因果,进而使民族志研究成为动态、开放的生成过程。

作为一种方法论上的敏感性,衍射有能力挑战长久以来研究者先于田野调查而存在的观点,并重塑体育民族志研究中研究者、被研究者以及文本表述的三位一体关系。这因为,“人类”的边界与构成总是在不断进行配置,当人与非人纠缠在一起的时候,民族志文本书写也就不再“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相遇”^[35]的主体性与主体间性问题,而是从关系性、情境感以及具体化的内部行动出发,发展出一种“作为与他者组成的回应”的物质实践^[36]。Brice 等^[37]运用巴拉德的能动实在论探索运动内衣(lululemon)如何总是与其他物质、社会以及非人类实体纠缠在一起并相互作用。但研究的起点并不是立足于既往民族志研究的方法设计或是技术驱动,而是试图建立起理论或方法的可能空间。研究者在其间以充分的注意力引导一系列理论方法的协同实验,旨在使身体、物体以及物质-话语之间的纠缠关系变得容易理解,以颠覆我们熟悉的反身性方法论及其以人为中心的传统思维模式。研究者们首先相约一起去参观 lululemon 实体店,以自身在商店中穿戴 Enlite 的不适与紧张思考物质与话语可能的力量纠缠,而不是将其简单理解为话语解释系统的产物。而后通过 facebook 分享自身与 Enlite 的生活经验,在大约 7 个月的时间里通过不间断对话收集到 100 多条有价值的文本消息以及 58 幅图像(其中有的是长篇的、高度个人化的反思,有的是对他人对话的回应,还有一些极具启发性的评论)。在衍射分析的具体操作上,作者沿用巴拉德为跨越“时刻-地点-事件”束缚对各

种女性主义著作进行切割与拼凑的办法,以颇具物理性质的“切割实验”将收集来的图片与文本内容进行多种方式的打碎重组。图片与文本在重组过程中发挥出不同的意向性作用,有效干扰了研究者的固有连贯思维,进而使作为观测装置的研究者关注到 Enlite 如何以某种方式限制运动身体并实现特定的女性运动,以及如何与全球化、资本主义、精英特权、可持续性、环境退化与气候变化在时空上发生纠缠的可能。

2.2 “力”的作用效果:材料组合消解研究者中心性地位

较之反身性研究强调质疑研究者的社会地位、情感以及价值观念如何影响与他者的相遇,衍射方法通过描述物质-话语的纠缠不再认为研究者是一个发号施令的自主主体,而是成为在民族志研究内部行动中摇摆不定的现象装置。但是孤立使用衍射方法的分析切割仍然难以避免研究者分析决策时可能会携有的强烈驱动^[38],霍桑效应已经在各种不同的研究情境中被证实。即便上文中 Julie Brice 等尝试通过切割重组处理在数字平台上与被研究者的对话,但研究结论总是依赖于研究者对于代理切割的选择,“白人、中产阶级、女性学者”这些标签可能在不经意间推动研究者利用自身的相关经验与视角来“衍射”数据。巴拉德的衍射分析虽然承认研究的情境性,也鼓励研究者通过数据探索揭示意想不到的丰富结论与深刻见解,但这种承认本身并没有为“研究者如何影响事件?研究者的调查过程对结论表述的影响程度如何?”提供明确的答案^[39]。

针对上述情况,Taguchi^[40]将德勒兹基于斯宾诺莎一元论哲学提出生机论观点作为对巴拉德衍射方法的有力补充,认为虽然德勒兹与巴拉德继承的是完全不相关的学术遗产,但二者本体论上同为一元论且都拒绝任何结构或系统的概念。在与瓜塔利合著的系列哲学作品中,德勒兹宣称他们的任务在于制造概念^[41],其一定程度延续着尼采权力批判与解放的要旨前行^[42],创造出诸如“生成”“块茎”“游牧”“去疆域”“欲望机器”等诸多概念。目的在于将世事视为去中心化的、流变不居的,以此形塑一种思维与观察模式来抵抗各种权力关系的支配。在这里,身体、物体、思想、社会形态以及其他物质性不是由主观性、形式或实体等固有方式定义,而是一种力的关系之涌现。实际上巴拉德也持类似观点,认为世界和历史是由一系列物质力量产生,这些力量从物理、生物延伸到心理、社会以及文化^[43]。

在该种新唯物主义思想的具体应用上,有学者秉持德勒兹“研究组合”的微观政治分析,认为社会人类学研究也应当被视作一个集合,每个具体的研究行为都是由特定的研究工具、记录分析技术、理论框架

和假设、物理空间与研究场域、期刊、编辑以及最终读者共同组合形成^[44]。知识生产的结果是组合中人类与非人材料之间的多重影响,而不是研究者自身有意或无意的代理行为。通过德勒兹的生机本体论来构造研究组合或装置,能为巴拉德“研究者作为摇摆不定的现象装置”提供新见解。无独有偶的是,朱炳祥^[45]基于主体间性关系中的客观性测量提出相类似的民族志“三重主体叙事”,要义也在于“民族志文本并非由民族志研究者一人创造,而是由当地人、民族志研究者以及读者(批评家)共同创造”^[46]的组合性思维。尽管其亦有能力打破既往民族志研究中以研究者为主体的单一镜像,但现实世界中的物质性力量还未被充分考虑进其“主体民族志”的书写当中。

仍然是一个对图文进行切割重组的例子。Safron^[47]以德勒兹生机哲学“力”的分析视角重新审视为期18个月的视觉民族志项目数据,通过设计“杂志剪贴”的组合方法,围绕“利用杂志和其他材料讲述任何你想讲的关于健身和健康的故事”的焦点讨论展开广泛生活对话。研究者(白人)和年轻人(黑人与拉丁裔)一起探索健身与健康的相关杂志,试图通过调查过程中的非线性时刻解释研究对象与材料的物质-话语关系。重要的是研究者充分展示自身在“数据、理论、文字、图像以及生活经验”^[48]的组合关系里如何受到人类(青年人与成年人)与非人类(剪贴簿、图像、文本)身体共同构成的纠缠影响。相较于上文围绕互联网数字对话进行的 lululemon 物质性探索,“杂志剪贴”的组合设计通过替代由研究者主导的数据收集方法,能进一步凸显出人类与非人类材料在杂志剪贴簿中纠缠着的身体以及对广泛的体育文化产生可能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组合的方法能够通过各种力量的相互联系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将研究视为组合也即意味着数据是“成为而不是存在”^[49]。在这种情况下,数据的制造不再由某个单一实体定义,其关键在于组合的创造性与复杂性所带来令人不安的时刻。

3 余论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新唯物主义已经成为一个集体术语,用来表示一系列共同“转向物质”的观点。其出现的时间节点与人文学科和社会理论“后现代主义”转向之后的“再现危机”大致吻合。因此,我们在以“主客位关系”为线索梳理至体育民族志研究主体间性的反身性思考后,就自然将目光看向这一极具影响力的新兴范式。哈拉唯与巴拉德的衍射分析以及德勒兹的研究组合在体育民族志中区别于既往研究主客体分离的观点,而是以一种关系性视角探索物质是如

何通过人类与非人类身体纠缠构成的。当然新唯物主义并不局限于上述几位思想家的卓越贡献,相应地在经验研究领域也发展出以 Pierre^[50]为代表的后质性探询的本体论讨论以及一系列可能的操作办法(例如故事补全^[51]、协作表演^[52]等)。这些发展将体育人类学的关注焦点从认识论转移至本体论,对支持观察与访谈等研究方法的传统人文主义发起根本性挑战。这一挑战能够破坏长期以来体育民族志研究的“自恋”问题,即研究者可以充分代表研究对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肯定的、实验性的成为本体论”^[53]。但后质性探询并没有一套既定的方法准则,它致力于打破理论与方法之间的鸿沟,用体育民族志故事来联结哲学思考、社会理论以及经验生活之间的动态关系。在物质性思维的指导下,未来如何基于中国体育人类学的本土研究情境发展出田野调查的创新性办法仍需学界共同的探索,而颇具实验意味的调查对一些惯来推崇“方法主义”的学者来说可能会是前进路上的困难,因此我们倡导国内体育哲学界与体育人类学界的携手共进,以继续探索我们对于人类与非人类世界的基本认识。

参考文献:

- [1] 刘朝晖. 海外民族志的田野调查与文本表述[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31(5): 7-13+72.
- [2] 刘中一. 人类学民族志中研究者的身份自觉[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45(2): 54-62.
- [3] 高丙中. 民族志的科学范式的奠定及其反思[J]. 思想战线, 2005(1): 75-81.
- [4] 朱炳祥. 再论“主体民族志”: 民族志范式的转换及其“自明性基础”的探求[J]. 民族研究, 2013(3): 60-74.
- [5] 胡小明. 原生态身体文化的田野调查[J]. 体育学刊, 2015, 22(3): 1-10.
- [6] 向有明, 向勇, 韩海军, 等. 身体动作与文字形成的双向实证研究[J]. 体育科学, 2013, 33(8): 57-63.
- [7] 杨海晨. 族群体育的实践理性与文化表达[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152.
- [8] 万义, 胡建文, 白晋湘. 苗族鼓舞文化生态变迁的人类学研究——湘西德夯的田野调查报告[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10, 27(6): 695-699.
- [9] 周传志. 台湾民俗体育“宋江阵”的社会人类学研究[J]. 体育与科学, 2013, 34(2): 99-101+110.
- [10] CLIFFORD J. On ethnographic authority[J]. Representations, 1983(2): 118-146.

- [11] 克利福德·格尔茨. 地方性知识[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49.
- [12] 涂传飞. 对民俗体育文化意义的解释——来自克利福德·格尔茨的阐释人类学流派的启示[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0, 33(11): 8-11.
- [13] 钟喜婷. 道德重构: 民间体育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动员的地方实践[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4: 47-50.
- [14] 许倬云. 我者与他者: 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M]. 北京: 三联书店, 2010: 51-56.
- [15] 高宣扬. 当代社会理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301.
- [16] 詹姆斯·克利福德, 乔治·E·马库斯. 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107.
- [17] 黄治国, 李银兵. 主体间性视域下的民族志书写[J]. 广西民族研究, 2017(6): 54-61.
- [18] FLETCHER T. "Does he look like a paki?" An exploration of "whiteness" positionality and reflexivity in inter-racial sports research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sport[J]. Exercise And Health, 2014, 6(2): 244-260.
- [19] SPENCER D C. Habit(us), body techniques and body callusing: An ethnography of mixed martial arts[J]. Body & Society, 2009, 15(4): 119-143.
- [20] SPENCER D C. Narratives of despair and loss: Pain, injury and masculinity in the sport of mixed martial arts.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Sport[J]. Exercise And Health, 2012, 4(1): 117-137.
- [21] NEWMAN J I. Comfortable in my own skin: Articulation, reflexivity, and the duality of self[J]. Cultural Studies Critical Methodologies, 2011, 11(6): 545-557.
- [22] NABHAH-WARREN, K. Embodied research and writing: A case for phenomenologically oriented religious studies ethnographies[J]. Journal of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2011, 79(2): 378-407.
- [23] GIARDINA M D, NEWMAN J I. Physical cultural studies and embodied research acts[J]. Cultural Studies Critical Methodologies, 2011, 11(6), 523-534.
- [24] 丁和根, 查荣林. 自我民族志的生命镜像书写及其价值反思[J]. 当代传播, 2024(1): 65-70.
- [25] 杨磊, 杨海晨. 主体性的追寻: 一个专业乒乓球运动员群体的自我民族志[J]. 体育与科学, 2019, 40(3): 11-22.
- [26] ELLIS C S, BOCHNER A P. Analyzing analytic autoethnography: An autopsy[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006, 35: 429-449.
- [27] NARAYAN K. The ethnographic I: A methodological novel about autoethnography[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2010, 108(1): 241-242.
- [28] 肖瑛. "反身性"研究的若干问题辨析[J]. 国外社会科学, 2005(2): 10-17.
- [29] 杜连峰. 试论表述危机之后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J]. 民族学刊, 2018, 9(1): 50-56+118-119.
- [30] DELEUZE G, GUATTARI F.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M].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37.
- [31] 熊欢, 张爱红. 身体、社会与体育: 西方学者视野下的体育[J]. 体育科学, 2011, 31(6): 81-86.
- [32] HARAWAY D. How like a life, An interview with Thyrza Nichols Goodeve[M].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102.
- [33] 杨艳. 从反身性到衍射: 回到生活世界——唐娜·哈拉维历史生成论的科学观[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9, 25(8): 23-28.
- [34] JAGGER G. The new materialism and sexual difference[J].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2015, 40(2): 321-342.
- [35] BARAD K.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quantum physics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matter and meaning[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392.
- [36] HOPPE K. Responding as composing: Towards a postanthropocentric, feminist ethics for the anthropocene[J].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2020, 21(2): 125-142.
- [37] BRICE J, CLARK M, THORPE H. Feminist collaborative becomings: An entangled process of knowing through fitness objects[J].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Sport, Exercise And Health, 2020: 2-18.
- [38] FOX N, ALLDRED P. Mixed methods, materialism and the micropolitics of the research-assemblag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ology, 2017(1): 2-14.
- [39] FOX N, ALLDRED P. Applied research, diffractive methodology, and the research-assemblag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J].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2021, 28: 93-109.
- [40] TAGUCHI H L. A Diffractive and deleuzian approach to analysing interview data[J]. Feminist Theory, 2013, 13(3): 265-281.
- [41] DELEUZE G, GUATTARI F. What is philosophy?[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9.

- [42] Michel F, Deleuze G. Intellectuals and power[C]//BOUCHARD D F.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 199-218.
- [43] BARAD K.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Quantum physics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matter and meaning[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161-194.
- [44] COLEMAN R, RINGROSE J. Deleuze and research methodologies[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3: 1-22.
- [45] 朱炳祥, 刘海涛. “三重叙事”的“主体民族志”微型实验——一个白族人宗教信仰的“裸呈”及其解读和反思[J]. 民族研究, 2015(1): 58-71+125.
- [46] 朱炳祥. 他者的表述[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41.
- [47] SAFRON C. Magazines make me uncomfortable: Discomforting, disruptive, and productive affects with youth in an urban after-school program[J].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Sport, Exercise And Health, 2020: 2-15.
- [48] HOLBROOK T, POURCHIER N M. Collage as analysis: Remixing in the crisis of doubt[J]. Qualitative Inquiry, 2014, 20(6): 754-763.
- [49] ST. PIERRE E A. The appearance of data[J]. Cultural Studies, 2013, 13(4): 223-227.
- [50] ST. PIERRE E A. Writing post qualitative inquiry[J]. Sage Publications, 2017: 1-6.
- [51] SMITH B. Some modest thoughts on story completion method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J].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 2019, 16(1): 156-159.
- [52] STERN T P, JUSSLIN S, KNUDSEN K N, et al. A performative paradigm for post-qualitative inquiry[J]. Qualitative Research, 2021: 1-18.
- [53] ST. PIERRE E A. The posts continue: Becoming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2013, 26: 646-657.

